

●今年,北京市开放“异地中考”,2.43万名非京籍初中毕业生仅3000名有资格报考职高,占北京中考总人数的3.5%

●“这一政策本想给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开‘绿灯’,但由于制定者对中职教育不了解,使新政由‘绿灯’变‘红灯’”

# 北京职高生源锐减令校长叫苦

本报实习生 杨召奎

今年,北京市首次开放“异地中考”,对于非京籍学生,如果属于通过资格审核的随迁子女考生,可以报考中等职业学校。但笔者调查发现,“异地中考”政策开放后,非京籍考生进入中职学校的门槛反而加高了。

据统计,北京市2.43万名非京籍初中毕业生,只有3000名左右有资格报考中职学校,仅占北京市中考总人数的3.5%,其余的学生或在京借考、借读,或返回原籍,或干脆没上学;同时,北京大部分职高学校也在这个号称史上最热的夏天遭遇了“寒冬”。

**生源大幅减少,校长们叫苦不迭**

9月1日,京城大多数职高学校正式开学,意味着他们的招生工作落下大幕。近日,笔者走访多所职高学校了解到,“异地中考”政策对职高的生源产生了较大影响,有的学校甚至没有招到一名符合政策的非京籍学生,生源的大幅减少致使不少职高学校校长叫苦不迭。

“以前我们学校非京籍学生约占三分之一,今年我们连一个符合政策的非京籍学生都没招到。”一所职高学校副校长说,“过去只要符合学校的入学条件,非京籍学生可以登记入学,不必参加中考。今年政策限制的厉害,学生报考职高必须参加异地中考。”

北京求实职业学校招生负责人说,“以前我们学校的外地生源在40%以上,今年不到5%。”他表示,“我们学校属于教委管,上面出台这样的政策我们也很无奈,但不得不执行。”

“我们也想多招些学生啊,可现在连公办学校都没有办法,更何况我们民办学校呢?”一位民办职高副校长坦言,这一政策对生源影响很大,学校备感压力。

**“订单班”“签约班”深受影响**

据北京朝阳区一所职高学校招生负责人介绍,由于今年是首次“异地中考”,很多随迁子女家庭措手不及。报考条件明确规定:进城务工人员须持有有效北京市居住证明、有合法稳定住所、合法稳定职业已满3年、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已满3年、其随迁子女具有北京市学籍且已在京连续就读初中3年学习

年限的,才能在京报考中职学校。

“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只是在北京做个小买卖或者打工,没有稳定住所和稳定职业,更别谈社保了。”该负责人说,由于非京籍生源大幅缩减,学校为企业订单培养毕业生的“订单班”也大受影响,两个就业率百分之百的“订单班”,不得不缩减为一个。

北京电气工程学校的热门专业“楼宇专业”,为外交部楼宇管理处定向培养学生,今年也面临招生缺口。该校校长刘杰表示,中石油等国企在该校的“订单班”同样受到巨大影响,无法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

据了解,除“订单班”外,一些学校与外地合作的“签约班”也受到很大影响。“以前,我们每年都有跟外地签约合作计划,整班招收外地学生,现在,这些学生不符合异地中考规定的五个条件,不得不取消。”

**技校火爆中专不受影响**

虽然同样是中等职业教育,但中专几乎不受新政影响。北京水利水电学校招办负责人表示:“这一政策对我们影响不大,我们在京外有招生指标,再说我们学校在京外招生的人数本来就不多。”北京市自动化工程学校招生办负责人同样表示新政策对其“几乎没有影响”。笔者从多所技校招生办了解到,他们今年的招生情况均好于往年,很多学校均已招满。

“技校属于劳动局管,不受政策限制,仍然可以为外地生源注册学籍。中专最初是行业办学,后来收归教委管理,而职高都是区属管理。为了发展职业教育,市教委多年前就给中专校提供了外地招生政策,允许中专京外招生。”一所国家级示范职高的招生负责人说。

他还透露,其实在“异地中考”政策出台前,北京的职高就开始接收外地生源了,比例一般在20%-60%不等。由于今年实行新政策,对学生进行资格审核,很多学生都被卡在政策之外。

“这就好比你之前盖了违章建筑,政府不管的话你可以居住,但是现在管起来了,你必须得拆除。同样,职高学校以前招收非京籍学生虽然是保证生源的无奈之举,也是被默许的,但是违规的。现在政策限制,不让招了,生源自然受到影响。”该招生负责人说。

**想开“绿灯”反而变“红灯”**

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曾表示,随迁子女升学考试政策调整的出发点是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提供升学考试服务,需要严格对家长的社保和职业的年限要求,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出现“高考移民”,扰乱教育秩序,影响社会稳定。

对此,东城区一所职高学校负责人认为,“这一政策可能是想给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开‘绿灯’,由于制定政策的人没有进行实地调研,对中职教育的实际情况不了解,致使新政‘绿灯’反而变成了‘红灯’。”

他同时认为,将门槛设在“中考”阶段并不合理,“很多随迁子女都在北京出生,在北京长大,小学初中也都是在北京上的,他们可以不在北京参加高考,为什么要限制他们报考职高呢?”他不担忧地说:“这些孩子大多十五六岁,正值青春期,年少轻狂,如果他们

没学上,很可能走入‘旁门左道’,这对家庭和社会和谐稳定都不利。”

朝阳区一所职高学校就业办负责人分析称,生源较少将导致部分师资和设备闲置,虽然学校没有权力辞退老师,不过学校也在承担一些压力,长期下去学校将面临更多问题。

“由于今年首次实行‘异地中考’,很多学生被卡在社保这一限制条件上,以后,学生家长肯定会补齐社保,这样就有更多的学生可以满足这一政策。”朝阳区另一所职高招生负责人对新政表示理解,他表示,这一政策出台后,满足政策的随迁子女不仅可以在北京报考中职学校,并且三年后还可以参加高职业学校的考试。此前,他们只能参加成人高考。

**职高学校“各显神通”应对生源危机**

生源减少令不少职高学校备感压力,为应对生源危机,他们“各显神通”。据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有关负责人介绍,该校已申请

成人中专资质。学生如果报考,毕业后可以获得成人中专毕业证。

拥有成人中专资质的劲松职高老师分析,之前没有申请该资质的学校今年生源可能会受到较大影响。在黄庄职业高中,学校计划由培训部承担新的培训任务,将来18岁的学生可以参加成人中专考试。如果当前“异地中考”政策不变,一部分学生将来满足18岁条件,可用成人中专的学历注册学籍。

西城区一所职高学校相关负责人说,“我们过去的大班教学,今年会细分成小班授课,课时少的老师将被安排到企业、高等院校进修。”

北京电气工程学校一位负责人说,“我们有先进的设备,良好的师资,可以通过社会培训的方式解决目前的困境。”对于此前媒体报道的“示范校”面临摘牌的危机,他认为,“这不大可能,以前示范校的政策硬性指标确实是4000人,现在招生政策变化了,示范校相应的政策应该也会变化。”

## 职高“生源危机”靠“自救”不现实

杨召奎

8月底,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总数为658.21万人,就业学生637.51万人,就业率为96.85%。在喜人的就业率背后,一些职高学校的校长们却眉头紧锁,叫苦不迭。

这源于北京今年首次出台的“异地中考”政策。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随迁子女升学考试政策调整的出发点是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提供升学考试服务;在职业学校看来,这一政策说的是今后将“严格限制”招生。

相比往年,今年职高学校生源大幅减少,有的学校甚至减少五成多。在现行体制下,职业高中是由各区县按“教师人头费+学生综合定额”拨款的。因此,招生数量对学校接受财政拨款的影响很大。换言之,职业高中的“生源危机”会加剧“财政危机”,进而可能会导致“生存危机”,这才是校长们真正的烦恼。

职高学校的生源危机由来已久。自上世纪90年代末普通高中扩招后,高职学校的生源就成了问题。从那时起,招收外地学生就是职高学校生存的重要途径,而政府对职高招收外地生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新政策实施后,很多随迁子女因无法通过资格审核而与职高无缘,使得职高生源危机再次凸显。

“生源危机”成为影响职高发展的“瓶颈”,背后其实是“吸引力危机”。一方面,北京的家长们普遍望子成龙心切,受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观念影响,多数北京市民不愿孩子读职高;另一方面,职高就业形势虽好,但毕业生就业去向大多是基础岗位,就业层次不高,上升潜力不足。当然,也有高者能达到每月8000元甚至上万元,但总体来说,毕业生收入在3000元左右。

随着北京应届毕业生数量的逐年减少,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职高学校想通过提升自身吸引力的“自救”方式,多吸引本地生源来解决“生源危机”问题并不现实;通过向进所在。

京务工人员、下岗职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自救”方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生源危机”,但并非所有职高学校都具备这样的条件。

事实上,北京职高优质的教学资源、较多的就业机会、优厚的补助措施对随迁子女尤其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有较大吸引力。如今,报考中职学校的限制条件太严苛,不仅使职高学校面临生源危机,也使企业的用人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更给北京的随迁子女带来了不少麻烦。正如一所职高学校副校长所言,这些孩子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学于北京,他们可以不高考,可以不要学历,为什么要限制他们报考中职呢?

职业教育不同于高等教育,它不是学历教育,而是技能教育,是生存教育。如果严加限制,很多想读中职的随迁子女不得不面对在京“求学无门”的尴尬。如果这样,试问这群年轻人如何健康地走向社会?没有一技之能,他们如何生存?他们又该如何面对与父母分离两地的痛苦?



合肥环卫工劝阻散发小广告遭拳打脚踢

9月10日,合肥市三院,受伤躺在病床上的尚培全。

9月9日上午,在安徽省合肥市望江路与马鞍山山路交叉口,张兆金和工友尚培全在劝阻散发车窗广告传单时,被两名散发小广告的年轻人当街殴打,瘦小的尚培全被打得满脸是血,受伤倒地。

文羊 摄/东方IC



建筑工人当“模特”

9月2日,2013年湖北省“最美农民工”公益美术创作活动启动,该省16位艺术家汇聚中建三局二公司武汉绿地中心建筑工地,现场写生创作。有着黝黑面庞,堆积皱纹,温和笑脸的农民工马师傅平生第一次做“模特”,被众画家围着写生有些紧张。半小时后,看到画家们不同角度的写生作品,马师傅笑着说:“画得真像。” 邓秀琼 张隽逸 摄



农民工学消防

为增强农民工的消防安全意识,日前,威海消防支队经区大队人员到农民较多的建筑工地,教他们使用灭火器,学会从火灾中逃生。 汤琨 摄

远安县总工会多举为农民工办实事

本报讯 (记者张翀 通讯员张芳)日前,湖北远安县总工会“农民工维权月”活动收官,这项活动搭建了维护农民工权益平台。

据悉,在两个月的“农民工维权月”期间,该县各基层工会自筹慰问资金103.5万元,慰问农民工5007人,重点企业为一线农民工发放高温补贴近56万元。县总工会自筹慰问资金5.8万元,为农民工购买防暑降温用品。

截至8月底,这项活动共为1363名农民工清欠工资1087万元,清欠率为100%。该县筹集资金14.9万元帮助138名农民工子女入学。

县总工会自筹8.24万元资助55名农民工子女圆大学梦,同时,为农民工家庭高校毕业生提供创业指导及培训52人次,帮助落实就业扶持政策68人次,实现就业261人次。

## 从“门外汉”到技术尖子

——工长周永忠与29名农民工

本报记者 黄榆

本报通讯员 姚睿林 万乘里

周永忠是水红铁路最艰苦的雨格线路工区一位工长,芝麻大的“官”,成天与铁轨、枕木、道砟打交道,在他的培养下,29名农民工从“门外汉”逐渐成为技术尖子。

雨格工区位于三家寨至松河站间,管辖水红线9.8公里线路,地处大山深处,交通极为不便,生产生活条件差。

2011年12月,周永忠刚担任柏果线路车间雨格线路工区工长时,工区面临线路翻浆、接头弹砟、胶垫超垫等问题,严重影响铁路运输安全,而班组人员均是附近村镇农民工,业务技能低,安全意识差,导致维修设备技术标准低、保质期短等诸多问题。

周永忠找来《铁路线路修理规则》、《工务



## 繁华落尽空留“无人村”

9月4日,广东开平,只剩下两户人家的福和里。关沃强和弟弟两户人家,从2005年开始便独自守候着福和里,村口的碉楼是他们堆放干草的地方,关沃强

偶尔会到碉楼顶上,看看村子的全貌,对他来说,这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关沃强说,等以后有条件,他们家也会搬进城里住。

村里人要么出国,要么搬进城里,关沃强的大儿子在澳门打工,小儿子在开平当老师,除了周末,平时家里只有老俩口。关沃强说,村子虽小,却有百年历史。福和里的大部分建筑物,都建于民国时期,村里碉楼的数目占全村建筑物将近50%。

钟锐 钟 摄/东方IC

## 农民工工资协调小组化解“欠薪风波”

本报讯 (记者何东霞 叶小钟 通讯员戴文)“没想到工资协调小组能为我们解决工资纠纷,很感谢!”日前,中建三局华润深圳湾综合发展项目部的工人张重告诉记者,由项目总包方中建三局建立的农民工工资协调小组仅两天就为他们讨回了20880元工资。

据介绍,由于项目地质条件复杂,锚索施工难度大,往往需要二次成孔,锚索要重新加工。为提升工人的积极性,6月,总包方分包,锚索班组长三方约定,二次成孔的工资6元/米,锚索重新加工费4元/米。完工后,工人们没拿到钱。张重拨通了工资协调小组副组长毛明浩的电话。协调小组立刻找到分包单位协调,最终说服班组按约定把20880元钱发给张重等3人。

## 梁山职业培训助农民工致富

本报讯 (记者孙爱海 通讯员王瑞萍 张思贞)“我在家乡销售卫生材料,每月收入2600多元,多亏梁山街道工会委员会牵线搭桥。”9月3日,山东省梁山县梁山街道孔坊村农民工陈昌勇高兴地说。

随着返乡农民工的不断增多,梁山街道工会委员会举办农民工掌握技能培训班,教他们在家门口“淘金”。根据该街道的区位优势,长远利街道工会举办市场营销、交通运输和养殖业等培训班。今年以来,举办实用技术培训班40期,培训农民工8000人次,有90%的农民工在家门口“淘金”致富。

本报实习生 冷天骄

教师学习圈作为北京市总工会的职工服务试点项目,从2012年启动以来,直接服务打工子弟学校教师500多人次,很多教师因学习圈而受益。

学习圈项目负责人、在“农民之子”做了6年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发展项目的王春华老师说:“我们对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关注,是从教师自身成长入手,他们的素质提升了,精神和情感受到关注,心理问题得到解决后,才能完成教育工作。”

王春华认为,普通培训和专家讲座不能满足教师人格成长需求,学习圈通过组织教师自发自觉的学习活动,是帮助其自我成长的有效形式。

学习圈源于欧洲成人教育

“学习圈”起源于瑞典非正规大众成人教育,已有100年历史。瑞典从欧洲最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最发达、最先进的

国家之一,“学习圈”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将学习圈理念引入教师培训,是为了倡导人们之间通过思想交流,共同提升。”据王春华介绍,“学习圈组织参与成本低廉,在教师居住的社区内,时间和经济成本低,没有人因经济原因放弃学习的;学习方法简单,每个人都能参与;大家平等交流,有相同机会表达自我,在规划学习方面都有发言权,通过讨论和经验分享,有问题可求助互联网和书籍。这种组织学习的形式和以往的培训完全不同,在教师们提升技能的同时,还搭建了沟通平台,给教师们封闭的生活打开了一扇窗子。”

教师学习圈的推广

学习圈刚刚推广时,遇到很大阻力,王春华回忆一年多的工作很感慨。2012年,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温暖基金会与农民之子合作,开始对教师学习圈的推广。

那时,学习圈在国内还没有现成理论指导,它不仅要解决老师心理和精神层面的需要,还要在技能提升上兼顾,需要教

师工作团队摸着石头过河。王春华和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卫宏翻遍国内外科研杂志,利用双休日组织团队学习。学习圈内容的设定是一项难题,光是走访和调研就用了近3个月。王春华说,那段时间是最累的,每周都要到各学校与老师沟通过。

在学习圈中成长

25岁的程玉婷是新源打工子弟学校的英语教师。她说:“我喜欢英语,但它又是我大学最弱的一门功课,工作后偏僻又当了英语老师。去年,我带的班级要升5年级了,我心里没底。这个班是我从3年级带上来,很有感情,舍不得放下。如果继续跟班,我怕耽误孩子。我以学习圈还是专家讲,我们听,没有参加的动力。这时,王春华